

校園、紙張與民國時期北平文壇的沉浮

——一項基於歷史地理因素的期刊考察*

冷 川

【提 要】 民國時期，北平校園環境對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從五四至抗戰，校園既是現代文學和商業出版之間的緩衝，也是知識分子吸納社會資源的中介；淪陷時期，教會學校成為政治的庇護所，校方既加強學生對校園的認同，亦資助學生進行創作和編輯的訓練。從抗戰後期直到新中國成立，全面的經濟緊縮乃至崩潰，使得校園失去了對文壇的調節作用，也肅清了自由知識分子和左翼人士接續30年代文壇傳統的努力。在這一過程中，印刷用紙的變化及短缺問題尤其明顯，它使源自解放區的文學生產模式在北平順利推廣開來，對於共和國文學體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北平 校園 紙張供應 文學生產模式

【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4 - 0079 - 11

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地域文化考察，自京海派文學研究起。尤其在京派領域，成果豐碩。京派文學意味著一種美學風格，一個有著同人性質的作家群體，同樣也代表了一種文學的生產機制——作品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均高度以校園為依託，作家在象牙塔內眺望人生，面對社會問題發言，並較為從容地進行各類文體實驗。可惜京派存在的時間不長，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到1937年抗戰時便已風流雲散。但北平文壇對校園的這種依賴關係，卻自新文化運動始，直到40年代，京派僅為其中一環。^①其間校園角色幾經變化，並最終隨著內戰時社會經濟的崩潰走向衰落；在這片文壇廢墟上，一種源自解放區的、對社會經濟水準要求極低的文學生產模式卻悄然建立起來。較之於人們熱議的1949年後作家的思想改造、文學制度的建立等，這次社會生產力的急促下降，並導致的北平文壇傳統的崩潰，對於共和國文學的建立，更具根本性的意義。我們不妨借這些年該區域文學刊物的變化，一窺其中端倪。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外交事件和中國現代文學民族話語的發生”（項目號11CZW055）的階段性成果。

簡言之，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到1949年建國，就刊物層面而言，北平文壇大致經歷了兩個高光時期：五四和淪陷的前半段。還有一個被司馬長風等文學史家稱為“默默耕耘的沉潛時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在上述三個時段，校園特色成為我們理解北平地區文學刊物的關鍵。從1941年底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到北方內戰的基本終結是北平的困頓時期，此時，一個物質性的因素——紙張的供應問題——被凸顯出來，在40、50年代的文學轉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一、抗戰前北平校園在文學活動中扮演的角色

北平地區從民國建立以來一直是高等學府的集中地，五四運動又將學校師生推向了歷史前臺。書局樂於印製新文學書刊，根本上講是因為有利可圖，但校園的存在又給新文學的出版業提供了額外的保護。教授們的高收入可以使他們分攤同人期刊的印刷費用，或者就掛靠在某一書局或報紙副刊之下，由對方提供經費和發行渠道；學生創辦的刊物則往往有著校方的資助。這些錢也許不多，但它的性質和上海地區由書局投入的資金不同；從某種程度上說，北平的文學期刊享有商業運作之便利，卻無盈利壓力。

這種資金狀況也連帶著引出了一個編輯方面的問題，大多數有著校園背景的刊物都採用來稿照登的形式，編輯的主要職責不在於甄別稿件，而在於和創作團隊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至於稿件質量，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作者的自律。從20年代初期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等到30年代初期中法大學所辦的《孔德文藝》等，莫不如此。這些由學生會、學生自治會、文藝研究會所辦刊物，向來不乏名家捧場，但稿件的良莠不齊和編排的雜亂也同樣令人驚訝。以1929年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的《燕大月刊》為例，學校每學期為刊物提供八百元經費，凡本校師生來稿，不加刪改，一律刊載。如果遇到紙張、印刷費用上漲，編輯的對策就是壓縮出版規模，如原來計劃出版六期，現在則將其中二期改為合刊。冰心、韋叢蕪、陸志韋、郭紹虞、俞平伯等，都為《燕大月刊》提供了稿件，但應景之作甚多，即使名家文章亦讓人難以卒讀。對於這種情況，編後記中的抱怨之聲如今看來非常有意思，大意是刊物質量不佳，罪在作者。至於多餘的稿件，悉數交給下屆學生會處理。^②小小的校園刊物如此，發行量達三萬份之巨的《語絲》也是如此。北平時期的《語絲》的實際編輯人是周作人，他對於稿件的處理，所做的主要是編排審校的工作。^③正因為對於編輯的許可權有所限制，刊物同人才能“率性而談”，避免編輯個人的意圖對整體活力有損傷。

將報紙副刊全權交給校園中人來打理，由報社負責提供資金和發行（一般是隨報贈閱），實際也是一種兩相便利的方式，並使校園介入北平文壇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如1926年創辦的《世界日報副刊》請劉半農負責，劉氏的創作團隊擁有魯迅、周作人、章衣萍、許欽文、韋素園、韋叢蕪、高歌、向培良、沈尹默等人；這批中堅作家也常常推薦某些青年學生的稿件，如魯迅就曾推薦過許廣平的文章，自然也會予以刊載。^④書局出錢辦刊，但將刊物的編輯權悉數交給校園中人，更是一種常見的方式。1928年文化學社出版了《北京文學》半月刊，撰稿人有李健吾、程鶴西、蹇先艾、朱自清等人，刊物每期不過50多頁，但不乏佳作，李健吾的中篇《一個兵和他的老婆》就發在這個刊物上。《北京文學》所載廣告不少，但十之八九均為介紹文化學社自己所印書刊。刊物的補白處會發表某些通信片段，如李健吾和吳文藻的通信，所談為後者留學期間所譯《我的生涯》一文的勘誤，和《北京文學》的內容實則沒有什麼關係，此類同人之間“自說自話”的做法，書局亦悉聽尊便。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供職於書局或報紙副刊的編輯也保持著一種微妙的立場——魯迅的《我的失戀》本是遊戲之作，周作人的《徐文長的故事》亦有冗長之嫌，但在編者孫伏園看來，若是稿件多而往後推延無可厚非，已經發排又撤稿卻萬萬不可，實則也是對這種編輯慣例的堅持。^⑤

撤稿事件使孫伏園轉投《京報副刊》。《京報》作為後起刊物，它在與《晨報》的競爭中將某些方式推向了極致。《晨報》的副刊和校園之間的關係本已密切，但它的定位是一個“教授”投稿園地。最初的編者是李大釗，之後則輾轉於孫伏園、劉勉己、湯鶴逸、丘景尼、江紹原等人之間，1925年10月起則由徐志摩接手。其子刊物《文學旬刊》（1923年6月1日創刊）則由文學研究會的王統照來主持，對於稿件的選用極為嚴謹。《晨報》每年年末出紀念增刊，印製精美異常，稿件亦極一時之盛，如1925年文藝欄的評述提到的：

……熊佛西先生的《洋狀元》，余上沅先生的《兵變》兩篇戲劇，尤為創作中的傑作。凌叔華女士的《太太》，描寫社會現狀，備極巧妙，於世道人心必有深厚的裨益。丁西林先生本以戲劇名，本刊所載《清明前一日》，是丁先生小說的處女作，將來在文學界中，必定可成一個紀念品。楊振聲先生的《李松的罪》，雖是短篇，卻極精練。楊先生原稿從十六頁縮至八頁，又從八頁縮至六頁，可見經過了不少的苦心推敲。……

《京報》則大大降低門檻，它所考慮的是如何在保持部分名教授的稿件外，進一步將北平在校學生悉數吸納進來。除孫伏園負責的《京報副刊》每日出一張外，另設多個子刊物“承包”給校園社團或文化名人，輪流出版，如：

《戲劇週刊》，凌霄漢閣編輯，星期一出版。

《民眾文藝週刊》，荊有麟等編輯，星期二出版。

《婦女週刊》，薔薇社編輯，星期三出版。

《兒童週刊》，兒童報社編輯，星期四出版。

《莽原週刊》，魯迅編輯，星期五出版。

《文學週刊》，綠波社與星星社合編，星期六出版。

《西北週刊》，星期日出版。

《經濟半月刊》，北大經濟學會編輯。

《社會科學半月刊》，北大愛智學會編輯。

《鬻策》為《京報》所做廣告稱此種做法為“與北京國立私立各大學團體為破天荒之大合作”^⑥。各類副刊隨報贈送，不再加價。自然，很多子刊物壽命不長，會有新的刊物來代替。如1925年6月創辦的《國語週刊》，由錢玄同、吳稚暉、周作人、胡適等人主持，以反文言、提倡新國語和創建民眾文藝為號召，每逢周日出版。

即使孫伏園本人直接負責的《京報副刊》，也採用了一種近乎不加節制的向校園出讓版面的編輯方式。他接手時正值五卅案期間，從1925年6月到9月，副刊的版面被出讓給大量學生團體——清華學生會（《上海慘劇特刊》）、北大學生會（《滬漢後援專刊》《北大學生軍特刊》）、女師大附中學生會（《反抗英日強權專刊》）……這些特刊的撰稿人中不乏王造時、顧頡剛等知名教授，但主要則是荊有麟、陳銓、周倫超等青年學生。他們的文章實則沒有太多可取之處，思路則明顯受到《現代評論》《醒獅》等刊物的引導。對比一下此時的《晨報副刊》——文章是清一色的專家之作——水準高下立判。但在滬案期間，新興的《京報》卻搶去了老牌《晨報》的風頭。

孫伏園的做法贏得了關注，付出的卻是刊物質量下降的代價。對於任何一種以質量求生存的出版物，出讓或部分出讓編輯權都非明智之舉。但在北平這座文化城中，學界勢力強大，充分調動校園的熱情，讓師生悉數參與進來，不僅提供稿件，而且由他們繼續閱讀傳播這些文章，從而爭取對社會最大限度的影響力，是出版業最便利的成功途徑，亦是編者身處北平所擁有的“特權”。這種方式直到30年代，仍在北平的報紙副刊中沿用。

毫無疑問，此類做法催生了大量不忍卒讀的短命刊物，但也確實給有志於寫作的青年學生以充足的試筆機會，總會有一些具有文學天賦、且對稿件質量有著嚴格自律意識的青年人脫穎而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文學社團亦不乏成功例子，女師大的薔薇社給《京報》編過《婦女週刊》，也給《世界日報》編輯了《薔薇週刊》。她們的稿件質量基本可以保持在及格線上，甚至也會出現一些精品，較之於魯迅、周作人等人主持的刊物毫不遜色。自然，最為出色的則是創辦於1933年底、隸屬於《華北日報》副刊的《每週文藝》。這個由朱企霞、錢晉華、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等人創辦的小型刊物，大致代表了戰前北平校園文學的最佳水準。這種報紙副刊的運作方式，實則給京派同人刊物打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1930年周作人等人創辦的小型文藝週刊《駱駝草》，雖屬獨立發行，但每期八版，形式上全然報紙副刊的神氣。同樣，20、30年代享譽文壇的《語絲》《水星》以及《大公報》文學副刊等也是同一種文學生產方式下的產物。

我們以往談及京派文學往往強調它的學院色彩——藝術上的嚴謹和強烈的文體試驗意識，但如果我們將目光集中於它的期刊運作方式，那麼“校園”可能是一個更應注意的因素。“校園”強調的是文學生產的背景及作家代系交替的過程性，這其中既有教授資源的整合，也有校方對學生文學能力的有效訓練，畢竟他們代表著文壇的未來。學校作為一個整體去爭取社會資源，在商業出版中提供額外的保護和緩衝，只要社會物質水準不降低到令校園難以維持的地步，那麼師生在文學活動中始終作為擁有較多資源的團體出現，這種“餘裕”狀態對於文化創造意義重大。

二、教會大學的保護和紙價飛漲的開始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北平迅速淪陷。國立大學紛紛南遷，大批作家亦隨之離去。燕京、輔仁等教會大學成為抗拒殖民教育的學生的首選，招生人數在擴展，入學考試亦趨於激烈。^⑦大致經歷了兩年的觀望後，在1939年底，北平文壇呈現復甦趨勢，張深切主持的《中國文藝》引起了廣泛關注，教會學校的學生期刊亦達到令人驚訝的水準。^⑧相對於大後方文學發展中的顛沛流離和遭遇到的物資匱乏，北平因為淪陷之迅速，社會生產能力反倒沒有遭到太多破壞。留守於北平的作家和新一代的學生重新開始活動，校園仍是他們的依託，無論經濟上的資助，還是政治上的保護。

30年代中期，華北成為中日矛盾焦點，各大學抗日情緒高漲，即使教會學校，亦在放縱學生日漸高昂的民族主義意志。燕京大學新聞系所辦的《燕京新聞》曾長篇累牘的連載各類勞軍、西北地方調查等宣揚抵抗意識的文字；^⑨淪陷後，教會學校和佔領軍當局達成某種諒解：前者控制學生的反日情緒，後者則不干涉學校的正常運轉。隨著國民政府檔案的解密，我們注意到若干留守教師，如後文提到的沈兼士等，實則負有在北方進行秘密活動之委託。^⑩但無論校方還是愛國教師們都會承認，對於淪陷區的學生而言，保有民族意識雖屬必要，但總要以不鬧出亂子為佳。教會大學有意識地加強了校園的凝聚力，以便使學生的精力有所投射。如果說淪陷前的20年中，北平校園對文壇的支持是面向社會敞開以獲取資源的話，淪陷後的學校更願意成為獨立於社會之

外的“孤島”。

我們注意一下輔仁和燕京兩所大學在淪陷時期的校園期刊，就會發現校方有著非常明晰的出版規劃。如輔仁，在學術方面有《輔仁學志》，每期中英文各半，印刷精良，厚薄則依據稿件數量靈活掌握。這種刊物用於學術交流，很少流入市場。校園生活方面，有一份每期30頁左右的月刊《輔仁生活》，刊發校內新聞、較短的學生習作以及英文練習，銷售對象是輔仁大學及其附中的學生。在這兩個刊物之間，則有如《輔仁文苑》這樣的純文藝季刊。燕京大學的情況相似，學術層面有《燕京學報》，文藝領域有《燕京文學》等，校園內部有《燕京新聞》；只是因為《燕京文學》保持著同人雜誌的特色，校方對刊物的支持力度不及輔仁。這類出版規劃實際將校園營造為獨立於社會外的“小環境”，意在喚起師生對於學校的認同。

在輔仁的三份刊物中，校方致力最多的其實是《輔仁生活》。它原本由學生個人創辦，後由於經濟原因“乃求借款於學校”；輔仁校方積極回應，也由此加強了對這份刊物的管理，此後編輯部的換屆始終在校方監督下進行，院系助教及附中教員也一度接手編輯工作。^⑩《輔仁生活》的成功，就校內而言，在於它加強了校方和學生的溝通，校長陳垣、文學院長沈兼士都積極參與，學校的各社團也借此刊物聯絡，第7期還曾出過《校友返校專號》，以加強畢業學生對輔仁身份的認同。在這一期的讀者來信中提到：“《輔仁生活》已提起了整個輔仁的興奮，學校和師生間已不像先前那樣隔膜了，一般同學對於貴刊熱烈的企求，也足以證明我們的輔仁，的確是需要有這樣純潔活潑的刊物，來宣揚一下她的精神，來代學校對學生說幾句話，來替同學對學校貢獻些意見……”就校外而言，它的廣告以“校園生活”和“英文練習”為號召，對青年問題多有關注。這份小刊物很快擴展到了輔仁之外，從第10期的啟事看，編輯部已經聘用專人負責北平及外地的出版和郵寄工作了，可見發展之迅速。

《輔仁文苑》的第一期原名《文苑》，出版於1939年春，原本是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幾個文學愛好者自費出版的“友誼的純文藝集刊”，印出後主要用於饋贈。^⑪此後輔仁校方主動介入，將其變為輔仁校刊，1939年12月10日出版第2期時，正式更名為《輔仁文苑》。刊物兼收論文、創作、翻譯和書評，每期容量在20萬字以上，教師身份的楊丙辰、李霽野等，學生身份的吳興華、林榕、張秀亞、白峰、查顯琳等均為創作主力。《輔仁文苑》不再是鬆散的同人雜誌，編輯力行審稿之權，排版美工等亦有專人負責，從風格上說，《輔仁文苑》似乎在模仿30年代引領文壇的《文學》和《文學季刊》。這份刊物的發行量不宜被高估，一開始它完全沒有征訂計劃，出到第5期時（1940年11月），編輯提到由於印刷費和紙費暴漲，印數受限，因此要減少贈閱規模；同時，因影響力漸長，北平及外埠已有征訂之意——說明至少在最初的一年中，這個刊物的發行思路僅在校園之內。此後的發行量亦不可能太大，《輔仁文苑》靠學校提供經費出版，完全沒有商業廣告，1941年後北平的物價指數不斷攀升，賣得越多只會賠得越多。刊物從第6期開始，隨著學生的畢業，編輯部人員有三次大調整，各欄目的負責人間也有“輪崗”現象，只有入學較晚的張秀亞貫穿始終。這份刊物從任何角度看，都是輔仁校方給師生創造投稿園地、給在校文科學生創造實踐機會的產物。學校花費鉅資，作者、編者亦表現出眾。

創辦於1940年底的《燕京文學》是一個僅有20~30頁的小期刊，宋淇、孫道臨、吳興華、石奔、姚伊、黃宗江等撰稿人貫穿始終。作者多有幾個固定筆名——如孫道臨常用孫羽、孫以亮，宋淇常用宋悌芬和歐陽竟——以避免太過明顯的同人期刊色彩。這份刊物受校方經濟援助可能不多，但它可以通過與校內其他組織的合作來得到支持，並強化校園內部的聯繫。如2卷3期（1941

年4月15日)上有該刊同人公演獨幕劇的啟事:

本刊同人擬於春假後,公演獨幕劇數場。有:《戲》,黃宗江;《我們的時間》,姚伊;《開會》,石奔;及英文戲兩場。

此次公演,不售門票;日期地點,尚未定妥。一俟決定後,再於《燕京新聞》中發表,敬希注意。

在《燕京文學》出版經費困難之際,燕京劇團在校內禮堂公演曹禺改編的《鍍金》(法國,拉必史)和李健吾改編的《說謊集》(英國,蕭伯納)二劇,以籌集經費。^⑩孫道臨正是在燕大期間出演了曹禺的《雷雨》《鍍金》等戲後,才走上專業演劇之路的。

教會大學強化校內聯繫,以避免學生對社會事務過多介入的做法,實則和八一三抗戰時,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交戰地帶設置安全區的做法極為相似。^⑪學校成為脫離政治紛爭的一方淨土,日本人則是一個必須回避的話題。教會大學的文學期刊從不介紹日本文學,與其說是文化立場的選擇,毋寧說是校方出於安全考慮的紀律要求。這一背景也給現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範例。新文學從發生之日起,便積極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前文提到的孫伏園在五卅案期間的編輯策略,便是在利用學生的政治激情以擴大刊物影響。但在燕京、輔仁這種“封閉”環境中,直接面對社會問題發言的道路被阻斷,刊物中青春成長氣息卻漸漸濃厚起來。《燕京文學》的發刊詞,據說出自宋淇之手:

這些日子來,我們一直沉默著。我們沉默了很久,很久,而現在我們再也忍受不了這沉默,我們要說話,我們要歌唱。……在這長長的,嚴冷的冬日裡,我們帶不來“春天”。我們沒有這能力,也沒有這野心。我們要說話,我們要歌唱,可是我們的“歌聲”也許會很低,很輕,輕得別人連聽都聽不見,更不用說能使別人的心“異樣的快樂”。但,假如這歌唱不是為別人,它至少是為我們自己。我們至少能聽見自己的歌聲。一個人不見得是他自己最好的欣賞或批評者,可是在這種情形下,欣賞和批評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們要的是一點自信,一點憑藉。況且一切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樣壞,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反響,也許我們的歌聲能在這片空曠的“莊園”裡引起一陣回聲,引起一點攪動。^⑫

以往論者往往視其為對日偽政府的抗議。但如果我們細翻《燕京文學》各期的頭篇,就會發現這組文章實則自成體系,每期開篇選擇一個話題——美術、文學、宗教、生活態度、身體與靈魂等——和讀者進行交流,敘述中充滿了成長過程中的人生感喟。在1卷6期(1941年3月1日)同一位置所發的《回顧和展望》中,編者提到因為畢業造成的人員更迭,並從這個角度談到《燕京文學》對他們的意義:

正因為聚首的日子短,我們才更應該使這些日子變得有意義。我們要使這些日子在將來“憶往昔”時成為一片錦繡——想起《燕京文學》來心裡會起一種暖和、溫柔的感覺。……下半年我們雖然比先前更忙,但這並不能成為退縮的理由。在這種情形下,維持這刊物顯然是一種挑戰……這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試試我們的力量、精力和毅力,……它(《燕京文學》)代表我們的理想。

淪陷時期的北平教會大學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實則扮演了一個非常奇特的角色。這些大學的教會背景將“為人生”的訴求和西方現代文化資源引入校園文學之中;國家的淪喪也促成了學生的早熟。他們的習作全無矯揉造作之氣,文字的老練,體驗的深刻,均令人驚訝。由於學

習的視野被置於亞洲之外，這也和周作人代表的京派口味拉開了足夠大的距離。僅從文學角度而言，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和北平淪陷區的校園都達到了民國時期校園文學的最高峰，它們的區別也顯而易見，前者用現代的方式談論政治，後者以現代的方式回避政治。恰是因為如此，後者才顯得彌足珍貴，它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遮罩掉政治激情後，中國文學可能是一種怎樣的形態。

這幾份刊物的定價和紙張問題同樣引人注目。翻開編輯欄，編者對於紙張和印刷費用上漲的抱怨不絕於耳。《燕京文學》持續一年，從創刊到2卷3期（第9本）定價均為2角；2卷4期則是2角5分，編者解釋說是因為紙價和印刷費用的上升所導致。^⑩從3卷1期開始，該刊物成為月刊，定價上漲為4角5分（本埠），但頁數增加不多。最後兩期的紙張發生了明顯變化，此前所用是一種進口新聞紙，從目前保留下來的刊物看，紙色發黃，較厚，較脆（加礬的原因）；後兩期則換成一種質地較白較薄的新聞紙，有輕微透墨現象，印刷清晰度亦有下降。這個時間已經到了1941年的10月份。不久日軍佔領燕京大學，迫使學校解散。《輔仁生活》開始定價5分，從第6期（1940年4月底）開始同樣因為“紙價飛漲”的因素，售價提高到1角。3卷1期（1941年9月中）開始，新的編委會重提“輔仁第一”“師生一家”的原則，刊物的宗教色彩大大提升，關注點亦集中於校舍分配等具體問題上。定價已從刊物上抹掉，只是在刊中的某故事中提到，校外如訂閱“全年十期二元”。^⑪隨著紙價的上漲和佔領軍當局的壓力，估計刊物發行範圍有重新收回到校園內部的趨勢。《輔仁文苑》的發展軌跡大體相似，第2期學校接手時是1939年末，此後直到第7期，定價在3角到4角之間波動（上文提到的取消贈閱後，價格從4角回落到3角5分）。第8期出版時已到1941年的9月份，定價上升為5角，最後一期是10、11期的合刊，推延至1942年的4月底才出版，定價是6角或1元（注：原刊定價處有塗改痕跡）。這一期合刊同樣出現了換紙現象。毫無疑問，1941年年中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對於北平出版界而言，它意味著紙價有較大攀升和紙質的下降。說到《輔仁文苑》的停刊，現在研究中往往採用張秀亞回憶中的說法，說他們是拒絕偽教育督辦的收買，主動停刊以示抗議。^⑫自然，這可能實有其事。但《輔仁文苑》和《輔仁生活》兩份刊物，已讓校方補貼甚多，面對紙價飛漲恐怕難以為繼。選擇停刊其實是一種符合經濟常規的做法。

1941年下半年，華北地區物資的緊縮，和這年年底爆發的太平洋戰爭有著密切關係。中國印刷用新聞紙長久以來一直依靠進口，抗戰前，國民政府及諸多出版機構曾計劃聯合辦造紙廠以解決這一困境，但因戰爭的爆發而打斷。^⑬從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的海關進口情況看，德日美三國在中國紙張進口貿易中分列前三位；1938年時，日本超過德國躍居首位，並單獨壟斷華北市場。^⑭1939年的《華北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年報》顯示，日本向華北輸入的印書紙、印報紙（機制木造紙）總計164,407公擔，占到該地區進口總數（203,848公擔）的80%。如果算上日本實際佔領的朝鮮（194公擔）、偽滿洲國（2,283公擔）和關東租借地（2,527公擔）的輸入額，比重上升為83%。遲至1940年，日本政府已經有意識地加強紙張等資源的統制，以應付長期戰爭需要，華北正是被波及之處。^⑮紙價的上漲和紙源的不穩定，迫使校園刊物紛紛停刊，而在這一環境中尚能堅持下來的以純文藝為號召的雜誌，則往往有著官方背景，如《中國文藝》（1940年9月，張深切辭職，武德報社接手）、《藝文雜誌》等。這種情況越到戰爭末期越為明顯，1944年初創刊的《中國文學》中，柳龍光所寫“編後記”提到，1943年末“因當局調整華北出版界印刷資材之需給，多數刊物歸於停刊或合併”，《中國文學》正是合併《中國文藝》和新民印書館的《華

北作家月報》的產物，出版一年，前7冊價格均為2元，後四冊均為5元。同時期的《藝文雜誌》價格基本相當，只是最後三期出現了明顯的紙張質量下降和價格飆升。不過，這還不是華北出版業最為窘迫的階段，抗戰相持中大後方用馬糞紙印刊物的情況出現在這一地區，則是內戰時期。

三、被中斷的文藝復興與文學生產方式的轉折

抗戰勝利後，“文藝復興”一度成為文壇主調，承續30年代文壇中如《文學》《文學季刊》等“純文藝”風格的刊物和由左翼人士創辦的、有著明晰的政治批判傾向的刊物大量出現於華北文壇。但他們很快就面臨著極度的紙張匱乏局面。如1946年出現的《文藝與生活》月刊。該刊物撰稿者不乏馮友蘭、張東蓀、徐祖正、楊丙辰、郭麟閣等名流。從4卷1期（1947年2月）開始，黎錦熙、謝冰瑩、南星、李朴園、趙清閣、臧克家等人陸續加入進來，豐子愷的插圖亦時有出現。在這期的啟事上，刊物決定徵集五千固定讀者，可見發行情況著實不錯。目前見到的最後一期是第4卷2、3期合刊，遲至1947年4月出版。編輯室一欄談到，中間停頓一期是因為“紙張大漲價”。該期的頁數雖由原來的80頁左右減少為48頁，但改用較小的新五號字排版。從內容上說減少不多，但閱讀較為困難。中間各期所用紙張優劣不齊，說明該刊物沒有紙張儲備，亦無固定供給源。紙價大漲或短缺時，只得脫期或停刊。比它稍晚兩月出版的《文藝時代》情況相仿。該刊物由南星主編，它的作者團隊實力強勁：戰前主持《文學雜誌》的朱光潛是該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徐祖正等30年代京津地區的重要作家亦給此刊物供稿。吳興華、林榕、南星、沈寶基等，則代表了淪陷期間華北校園文學的中堅力量。吳興華最重要的作品幾乎都發表在該刊物上，如《演古事四篇》（1卷1期）《西珈》（1卷4期）等。刊物的編輯手法亦展現出引領文壇復興的決心：第3期集中刊發馮至十四行集的11首、南星柳絲輯的26首等，以便讓讀者充分感受該刊物的“分量”和“支持它的人所具有的大決心”。^②《文藝時代》的發行情況極好。第2期的“本社啟事”中談到，第一冊首印五千冊，迅速售完；因質優價廉，還曾出現了代售點私自加價的情況。因此決定吸納三千訂戶，此後增至一萬戶，行銷地區包括北平、天津、瀋陽、上海、漢口、貴州、綏遠、四川、青島等處。該刊物所出6期定價雖在節節攀升：500元、700元、800元、900元、900元、900元，但較經營成本而言卻全然虧損，第6期的“編輯室同人雜記”中明確寫道：“物價高漲，大家購買力減低；若像報紙一樣加價一倍，每冊一千八百元，似乎是個可怕的數目。即照現在的按本刊質量說起來其實是太低的價錢，據說也有人在書攤上拿起一本來又放下，嘆一口氣走開”——一句話將雜誌和讀者的窘境說盡。紙張質量下降到馬糞紙水準還能堅持出刊，是政治任務而非商業運營之道。既要保證刊物印製水準，又要控制價格，即使雜誌有金城銀行的廣告補貼，但仍不足以彌補虧空，只好停刊放棄。

純文學期刊如此，左翼背景的刊物也是這樣。1947年4月出版的綜合性月刊《雪風》以書評見長，刊物現存5期，定價均為1,500元，但後兩期的紙張質量下降明顯。這一刊物的行間距異常緊密，閱讀頗感困難。刊物第1期的徵稿啟事中，所涉範圍極廣，展現出宏大的編輯氣魄；雪風社同時在上海創辦《文史知識》雜誌，頗為注意兩地文壇的呼應和創作經驗的交流。但5期後刊物即告停刊。同年8月出版的《駱駝文叢》亦是一個極有特色的左翼期刊，主編青苗有延安魯藝背景，編輯視野較為開闊，如第2期較為集中地介紹馬雅可夫斯基，第3期介紹惠特曼，第4期介紹菲律賓詩歌等，都是頗有想法的規劃。但刊物的運營情況較為艱難，廣告業務亦平淡。此時北方的物價飛漲已經較為嚴重，刊物的第1、2期定價為4千元，第3期為5千元，第4期則升至7千元

且脫期1個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刊物的紙張質量之差，和抗戰期間大後方的地方刊物相當，所用紙張較薄較黑，透墨現象明顯。《駱駝文叢》的發行範圍尚可，重慶、西安、上海、開封、昆明等地均有訂貨。但從第4期編者催收代銷處款項的文字看，外埠書款難以收回，這恐怕是該刊物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

至於這時期的校園，它的特性已經湮滅在了經濟崩潰的大潮中。1948年北大學生自治會所辦的《北大半月刊》，是一個以時評為主、兼有文藝的綜合刊物，第2期（4月1日）的定價為2萬元，第9期（8月5日）已達15萬元，足見通貨膨脹之迅猛。前面提到的《燕京新聞》，1946年11月18日在北平復刊，最初的定價是100元，至1948年8月法幣崩潰前夕（第15卷第9期），單份定價已是50,000元。實行金圓券改革後，從1948年9月至12月，定價亦從最初的金元7分躍至6角。與此過程相伴的，則是刊物風格的變化。燕京大學的新聞系久負盛名，《燕京新聞》的創辦便是為該專業學生提供某種實習機會。在三十年代，《燕京新聞》在關注時政的同時，有相當篇幅用以討論校園內部事務。比如華北緊張時期，老生、新生就“拖屍”傳統（高年級學生夜間將新生從宿舍架出，丟入水池）是否應該保留有過激烈辯論和衝突；教務長司徒雷登亦有意利用此刊物在校方和學生之間建立平等對話關係——兩派學生在刊物上暢所欲言，學校最後根據討論結果決定處置措施。即便是頭版刊出的罷課遊行決議，旁邊也會出現校方讓學生安心學業的建議——新聞中立原則是《燕京新聞》的傳統。1946年北平復刊後，該刊物的左傾色彩明顯增強，對國內政局的評論和對校方的抨擊成為主流；文藝欄則在林陸的支持下，刊發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討論趙樹理的創作情況——從某種程度上說，此時的《燕京新聞》已是中共的週邊刊物。

抗戰的勝利，使日本失掉向華北大量傾銷物資的特權；而此時日本國內生產的匱乏，也導致無貨可賣。根據美國農務部某工程師1946年在日本制漿造紙業的調查報告看，1945年日本造紙業的蕭條，倒並非紙漿儲備耗竭，而是因為和造紙相關的“煤炭、藥品及木材之供應不足”，以及盟軍轟炸造成的生產設施損壞。^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德國。^③從進口情況看，戰後美國取代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國，但1946年時，國民政府為抑制通貨膨脹，鼓勵一切日用產品的大量進口，在當年形成了巨額入超，並使得政府外匯儲備耗盡。此後兩年的入超額雖大幅下降，但原因只是無外匯可用而引發的進口削減。^④這種因經濟疲軟導致的紙張進口匱乏同樣出現於歐洲各國。^⑤

更為致命的是，從1946年開始的高速物價膨脹，直接導致了刊物征訂系統的崩潰，正如汪家熔的研究所顯示的，民國時期雜誌的零售很少折扣，出版方往往鼓勵征訂，一般是全年12期或24期按10期或20期收錢，大致相當於預收碼洋的83.33%。這筆錢在很大程度上是雜誌的周轉資金，用以支付編輯出版過程中的各類費用。^⑥紙價暴漲，預收資金迅速貶值，無力購買印刷用紙，刊物的應對之道不外乎兩途：或靠外來津貼（商業的或政治的）維持，或主動停刊以避免損失。一個刊物如無固定訂戶，只靠市場銷售，所印數量勢必保守，如此亦增加了單本的成本，定價的提高又會進一步減少發賣數量，陷入惡性循環。征訂系統的癱瘓，對於所有依靠市場發賣的刊物，無論是自由知識分子所辦，還是左翼人士所辦，都近乎毀滅性打擊。後旅居香港的作家劉以鬯，回憶自己1946～1949年期間在上海辦書局的情形時談到，郵政業的惡性通膨使得“像生活書店那樣健全的出版機構”也將郵購部的業務停辦；而進入1949年後，“白報紙的價值比書籍更高”。^⑦早在1947年的時候，儲安平便已提出國民政府有意借紙荒以消滅不同政見的言論、只留下黨辦或政府辦的刊物的懷疑，亦可看出當時知識分子對政府的不信任。^⑧

但這種情形在華北地區，對40、50年代的文學轉型卻近乎便利，源自解放區的期刊徵稿和發

行方式順利推廣開來。1948年底，歐陽山主編的《華北文藝》在石家莊附近的冶河鎮創刊，從第4期開始遷往北平出版，至第6期終刊。《華北文藝》的紙張質量同樣不好，前3期尤差——可見面對全國性的紙荒，中共刊物亦在所難免。但它的徵稿方式已然不同，第2期的《編輯部通知》中提到，“請各地文聯、文協、文工團、劇團、雜耍團、宣傳隊、雜誌社、民教館、文教科和其他文藝機關團體經常來信，和我們發生聯繫；把當地文藝活動情形告訴我們，把經過群眾考驗，受到群眾歡迎，或他們認為可以用的稿件組織起來，記錄下來，或整理出來，盡速寄給我們”，並要求相關人員注意收集回饋已刊發稿件的群眾反應。至於發行，全部交給新華書店負責。蕭三、秦兆陽、趙樹理、孫犁、賀敬之、康濯等人是該刊物的撰稿主力，從第4期開始，宋之的、馬彥祥、歐陽予倩、俞平伯、葉聖陶、鍾敬文等人陸續出現——有限度地容納部分黨外作家，主要是為了配合文代會的召開。接下來創辦的《文藝報》最初完全圍繞第一屆文代會的籌備進行編輯，紙張亦無起色。雖對外徵稿，但撰稿人要經過嚴格篩選，內容亦限於“全國各地文藝運動的綜合或專題的報導消息”和“工廠、部隊、農村及各團體的文藝活動情況”。在第4期的《本報啟事》中，提到暫無征訂計劃——可見該刊物基本不面向公眾發賣。1949年10月份創刊的《人民文學》是一個例外，用紙的考究、銅版插圖的精美，都達到了抗戰前出版業黃金時代的水準——這是行政力量的結果，也意味著刊物等級的建立。

徵稿方式的變化有解放區農民動員的痕跡；新華書店完成的是對銷售的壟斷。第一次文代會的753位代表中，來自解放區的有400多名。他們代表的是“人民解放軍四大野戰軍加上直屬兵團，加上五大軍區，參加文藝工作的，包括宣傳隊、歌詠隊在內，有兩萬五千人到三萬人的數目。解放區的地方文藝工作者的數目，估計也有兩萬以上，兩項合計有六萬人左右”。^①此後，提拔來自各行業的文藝通訊員，成為《文藝報》極具示範意義的舉動，這批人的作品也佔據了文藝通訊的大部，並享有刊物贈閱等權利。^②新華書店壟斷銷售在此時期具有積極意義。雖然在此後的經濟恢復時期，舊版人民幣的貶值速度絲毫不亞於國民政府的法幣和金圓券，但各解放區新華書店的迅速統一卻使建立書刊的垂直發運系統、減少圖書備貨量成為可能，大大減少了出版成本——這是民國出版人的夢想，只是這一目標的實現建立在極度的物資匱乏之上。

華北紙荒促使文壇上留下的多為黨辦或政府辦的刊物，只是它們屬於一個新的政權。在民國時期，北平的校園可以為知識者贏得社會資源，亦可為他們提供政治庇護，但這要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經濟緊縮直至內戰時期經濟的崩潰，逐步擠壓掉了北平校園為文學活動提供的餘裕空間，當文學生產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發生危機的時候，一種適應較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文學體制在華北確立，並最終推向全國。近年來，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多關注於政黨的文藝政策、作家的思想改造等與創作有直接關係的領域，對與之相關的經濟基礎的研究似乎已經是一個過時的話題。事實上，當持續的經濟萎靡迫使文學生產方式發生改變的時候，我們應該細緻地追索這一改變的軌跡，而非將其當做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對此物質基礎的充分估量，亦有助於我們理解民國時期北平文壇的成就以及共和國建立時期文學的性質。

① 民國時期，北京名稱幾經變化：民國建立至1928年6月稱“北京”；1928年6月至1949年9月稱“北平”。為敘述方便，文中將民國時期的北京統稱“北平”。

② “編後記”，北平：《燕大月刊》，第4卷第3、4

合刊，1929年5月。

③ 陳詔林：《語絲的實際編輯質疑》，河南新鄉：《河南師大學報》，1980年第6期。

④ 宋景：《上火車》，北京：《世界日報副刊》，第

1卷第7號，1926年7月7日。

⑤孫伏園：《從晨報副鑄到京報副刊》，《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現代甲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223～229頁。

⑥《齋築周年紀念刊》，1925年3月1日。

⑦[美]傑西·格·盧茨：《中國教會大學史》，曾鉅生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⑧封世輝：《華北地區文藝期刊鉤沉》，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第1期。

⑨如1934年11月17日《太平洋雜誌主筆拉丁摩將來燕大演講西北邊疆問題對中國之重要性》，1935年6月6日《德王在燕大講內蒙問題》，1935年9月20日《馬季明教授談晉省基運已有成效》，1936年9月15日《綏東問題座談會》，1936年9月25日《燕大及各團體慰問二十九軍豐台受傷士兵》，1936年10月6日《梅貽寶暢談綏寧青甘教育實況》，1936年10月9日《燕大同學綏遠調查通信》，1936年10月13日《張家口宣化歸來》，1936年10月16日《梅貽寶西北四省概況及其問題》《薛文波談西北漢回民族之衝突》，1936年10月23日《法蘭絲女士演講西北最近情況》，1936年10月30日《教暴兩氏講蒙漢關係》，1936年11月17日《廿九軍秋操演習參觀記》，1936年11月20日《綏東抗戰將士後援會》，1936年11月27日起連載《赴綏勞軍返校報告》，1936年12月11日《白寶瑾講西北四省現狀》，1936年12月18日《戰地調查團通訊》等。

⑩桑兵：《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⑪編者：《本刊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北平：《輔仁生活》，第3卷第1期，1941年9月16日。

⑫林榕：《兩年的回憶》，北平：《輔仁生活》，第1卷第7期，1940年5月18日。

⑬“本刊捐款啟事”，北平：《燕京文學》，第3卷第1期，1941年10月10日。

⑭[美]阮瑪霞：《饒家駒安全區》，白華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⑮編者：《發刊詞》，北平：《燕京文學》，第1卷第1期，1940年11月20日。

⑯“啟事二”，北平：《燕京文學》，第2卷第3期，1941年4月15日。

⑰北平：《輔仁生活》，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

16日。

⑱張秀亞：《張秀亞全集》，第15卷，台北，2005年，第288頁。

⑲《溫溪造紙廠之創立會》，上海：《國際貿易情報》，1937年第2卷第22期。

⑳《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貿易報告》，上海海關總稅務司署統計科，1937年、1938年。

㉑石志洪：《日本政府統制下的紙業與印刷出版業》，重慶：《造紙印刷季刊》，1941年第2期。

㉒《文藝時代第三期》，北平：《文藝時代》，第1卷第5期，1946年11月1日。

㉓Robert J Seidl：《日本制漿及造紙工業》，朱裕民譯，台北：《台紙通訊》，1948年第2卷第4期。

㉔Otto Goy：《德國今日的紙荒》，李家渡譯，台北：《台紙通訊》，1947年第1卷第4期。

㉕吳申元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2頁。

㉖許桐華譯：《世界紙漿的恐慌》，上海：《銀行通訊》，1948年第54期。

㉗汪家熔：《舊時書業批發折扣》，《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

㉘劉以魯：《懷正，四十年代上海的一家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文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短綆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5年，第110～111頁。

㉙儲安平：《白報紙》，上海：《觀察》，1947年第3卷第9期。

㉚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中華全國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1950年，第27頁。

㉛李迎春：《建國初期〈文藝報〉研究（1949-1957）》，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51～54頁。

作者簡介：冷川，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人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100732

[責任編輯 陳志雄]